

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

——對「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反思

◎ 邱義仁

永祥這篇文章最精彩的，是「結語」的部分。而令人遺憾的，也是這個部分。因為在「結語」中，永祥已觸及「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複雜的動態關係，卻沒有再進一步加以闡釋，殊為可惜。

這幾年來，台灣文化圈逐漸形成一窩蜂批判「台灣國族主義」的流行風；一個至今仍不曾明確界定的名詞：「民粹主義」，甚至已被「民粹式」地加以消費，連一些號稱是「改革派」的保守政客，也常常把「民粹主義」拿來攻擊不比他們保守的人。但在這林林總總的論述中，鮮有去討論永祥提出的問題：「這兩套價值雖然針鋒相對，卻難以偏

廢」。結果，我們還是停留在靜態的概念區別層次上，而對這兩套價值既對立又難以偏廢的動態關係的探討，則付之闕如。這對瞭解台灣最近十年來的演變不但沒有幫助，甚至可能產生誤導作用。

區分「公民」與「國民」是不夠的

台灣的反對運動始於自由主義的論述與要求，但蔣政權卻認為這些有關基本人權的主張，須等到「反攻大陸」之後才可實施。換言之，如果「反攻無望」，「自由民主」也跟著絕望，這迫使黨外人士必須把自由主義的主張，扣連到「統一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認同」議題上。台灣國族主義於是逐漸浮現，也開始與自由主義結合。

用永祥的概念來理解的話，就是說：台灣人民的「公民」身分，必須透過對抗蔣政權的獨裁才可得，而蔣政權以中國領土的完整性與中國國族主義來壓制台灣人民有關「公民權」的要求，於是台灣反對運動不得不轉而主張將「公民權」只限定適用於台灣「國民」身上。

公民權的落實，有賴國家權力的維護與國家權力受到制度性的約束，而國家權力的行

使不可能在抽象、真空的狀態中進行，必定會以相當數量的「國民」為其範圍，因此，在概念上，實在不可能與國族主義的部分內在價值完全割斷，否則極易墮入虛無情境之中。永祥所謂「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不可偏廢」的提法，從這樣的動態角度去思考，才能凸顯其意義；也只有從這樣的角度切入，才能瞭解E.Gellner在其《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一書中引述J.Plamenatz區分「西方」（與自由主義理念相容）與「東方」國族主義的意涵。

自由主義不可未戰先逃

將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做簡單而絕對的二分，不僅在概念上對釐清這兩套價值之間複雜的相互關係沒有幫助，對掌握具體的歷史演變過程助益也不大。如果我們看看最近有關國族認同的調查研究，就可發現：儘管「台灣認同」已大幅多於「中國認同」，但也只約佔台灣人口四成多的比例。而我們也可注意到：在所謂「台灣國族主義者」的陣營中，至今仍為「轉型」與「基本教義」爭執不已。這些事實或許能讓我們不會那麼快就認定：台灣國族主義已「取得了道德與政治的制高點」。

其實，台灣國族主義至今仍與中國國族主義纏鬥不休，自由主義也尚未被台灣國族主義所取代。「轉型」與「基本教義」的爭辯，正是因「國族主義」內含的「權力」因子，是否會無限上綱至難以節制而引起兩套價值在同一陣營中的拉踞所致。對情勢的誤判，只是讓部分的自由主義者找到不必再繼續戰鬥的藉口而已。

結語

台灣的自由主義者若不能坦誠面對自身思辨上的不足，只會對國族主義（特別是台灣國族主義）做批判，以獲得自身道德上的救贖，卻不肯在這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投入落實自由民主理念與體制的艱苦工作，台灣的自由主義將很難脫離被邊緣化的危險，最後真的淪落至「對於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與國家主義式的政府體制，已經沒有置喙餘地了」。